

世界禁书文库

红 木

〔前苏联〕鲍里斯·皮利尼亚克 著

刘 丽 译

第一章

穷哥儿，预言者，乞讨人，流浪歌手，拉撒路，云游派教徒，先知，朝圣香客，愚人，癫僧——神圣罗斯生活中这些纷繁复杂的芸芸众生，以上帝名义乞讨和募化的人，装点着自有罗斯以来，自伊万王朝以来的几千年历史。一切俄国的史学家、民族学家和作家无不埋首笔耕，追忆这些逝者。这些疯子或痞子，大张旗鼓的虔诚信徒，都被称为教堂的骄傲之花，上帝的使徒，来世的祈求者。俄国的正统历史和经典文学也这样赞颂他们。

十九世纪中叶，一个住在莫斯科、就读于神学院但未修完课程、名叫伊万·雅可夫列维奇的癫僧死在耶稣登山节医院。因这癫僧有相当名气，于是采访记者、诗人和史学家做了大量文章，一个接一个撰文记述他的葬仪。有位诗人在俄国资格最老的《消息报》上咏叹：

疯人院在举行什么大典？
但见车水马龙来来往往，
全那么急急匆匆，
心事重重。
人丛里不断传来阵阵叹息，
声音是那样凄切：
先知伊万·雅可夫列维奇登天了，
一盏明灯熄灭了。

史学家斯卡夫龙斯基在《莫斯科特写》中说，死者入土

前，为他整整做了五天五夜、二百多次的安灵弥撒；许多人干脆就在教堂旁边宿夜。据葬礼目击者、《二十六个莫斯科伪先知、假癫僧和愚人》研讨文章的作者巴尔科夫记述，伊万·雅可夫列维奇的葬礼原订礼拜天举行，《警方公报》也已正式公布，但因一早出殡时在接踵而来的仰慕者之间产生争执而把它推迟了。究竟在哪里安葬？数方激烈争吵，几至动武，更不用说恶言恶语了。一些人要把灵柩运去斯摩棱斯克逝者的故乡。另一些人执意把他安葬在波克罗夫斯基罗修院，这是墓穴都挖好了，就在教堂跟前。第三类人强烈要求把他的遗骸存进阿列克谢耶斯基女修院。第四类人拦住棺材，硬是把它往切尔什兹村拖。史学家写道：“该时适逢阴雨，道路泥泞，灵柩由医院运送教堂、由教堂运送墓地途中，无论中年少妇或待字姑娘，小家碧玉或大家闺秀，一律匍伏地上，向灵柩致哀。”史学家还提到：“伊万·雅可夫列维奇弥留之际大便失禁，污物流了一地狼狈不堪，不得已命打更人撒上沙子以遮狼藉。仰慕者把沙子当作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争着捡回家中。孩子肚痛，母亲在稀糊里渗半匙这样的沙子，让孩子服用，果然病痛霍然若失。安灵弥撒后，堵死者耳朵、鼻孔的棉花也被分割成大大小小许多块，赠予参加弥撒的信徒。又因此人死于水肿，从棺木里不断滴下浊水，为此送殡者专门从家中带来小瓶接盛。死者所着衬衣亦撕成碎片，分赠善男信女。棺木厝放教堂期间，残疾人、疯癫者、伪君子、男女香客从四方云集，挤不进教堂的只得伫立街头。有的当众布道，有的诵经显灵，有的卜算祸福，有的公开募化，但听得大呼小叫，人声鼎沸。”伊万·雅可夫列维奇生前喜欢把他的洗脸水当作甘露赐给仰慕者，并能预卜未来，或用口述，或用手写。他的手谕已归入历史研究文

献。有个教徒向他讨教：某人可否择妻？他答复道：“你失去的，便会……得到。”

莫斯科有个叫“中国城”的市区，便是癫僧们云集之地。其中有写诗的，有学鸡打鸣或学孔雀和红腹灰雀叽叽叫的，有以上帝名义骂娘的，有的只把三句话奉为至圣，并将它代谕神意：“人生像童话，棺木才是家，躺着保平安！”有的人癖好狗叫，据说上帝的意志正是由狗叫来预示的。在穷哥们、乞食者、卜卦人、拉撒路、流浪歌手——神圣罗斯的贫民中还夹杂着农夫、小市民、贵族、商贩、孩子、老人、壮汉和生儿育女的婆娘。他们喝得大醉，专注于干酪和大葱头，他们在亚细亚的俄罗斯帝国的风平浪静中过日子。而葱头状的教堂尖顶象征着这俄罗斯生活。

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在俄罗斯的其他城市里还有另一类怪人。这些人的出现始于俄罗斯帝国而非俄罗斯王国。由这类怪人创造了一门艺术——俄罗斯家具。它自彼得大帝时兴起，伊丽莎白女皇时期粲然凸现。关于这种农奴时代的艺术，历史上并无文字记载，艺术家的名字也随着时光流逝而灰飞烟灭。这是一种个体的艺术，是在城市的地下室里，地主庄园的毗屋里，在烈酒和恶劣条件下产生的艺术。它肇始于十七世纪的法国艺术大师雅可布和布尔。才十几岁的农奴被送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再从那里送到巴黎、维也纳学艺。学罢回到圣彼得堡的阴暗地下室，再从那里回到地主庄园的毗屋，于是动手创作。一个能工巧匠往往以数十年时间来雕琢一张安乐椅或一张梳妆镜台，一个八宝箱或一顶书橱。他们喝酒，雕琢，死去。未完工的艺术品由他们的外甥接手。这些巧匠一般没有后代，概由侄甥继承技艺。巧匠一批接一批的死去，但艺术品留在地

主庄园和花园洋楼里供人鉴赏。鉴赏者坐死在安乐椅里，在八宝箱里珍藏他们的密信，小娘们对镜审视青春年华，老婆子对镜审视龙钟暮态。伊丽莎白和叶卡捷琳娜时代崇尚洛可可式、巴罗克式富丽堂皇的装饰艺术，喜欢在红木（包括黄檀木、紫檀木、蓝花楸木、桦木、花纹桦木和胡桃木）家具上饰以青铜及涡纹。俄国皇帝保罗是共济会会员，却不要花饰而要军人的粗犷线条。保罗的内寝布置得庄严肃穆，家具一律用抛光红木，黑绿漆面，加上黑狮和狮身鹰首怪物雕饰。亚历山大一世转向埃拉多斯，古典主义。红木雕刻艺术一直传到尼古拉一世，他又恢复了保罗的风尚，同他长兄亚历山大一世的豪华不可相提并论。

1861年农奴制崩溃，农奴工艺改由家具工厂取代：“莱温松”、“托内特”、维也纳式的轻巧家具成为时髦。但工艺师的侄甥们伴随着伏特加酒活了下来。这些徒子徒孙什么新东西也不创作，而专事复古。是他们保留下了爷叔们的技艺和传统。他们也都是单身汉，不爱多说话。他们为自己干的这一行而自豪，一如哲学家为自己的论点而志向高远；他们爱自己的工作，一如诗人爱自己的诗篇。他们仍住在地下室里。这些巧匠们绝不去家具厂，绝不肯拉下面子去修尼古拉一世以后的轻佻货。他们是古董家，复古派。他们从莫斯科人的住家的阁楼上或未遭火劫的地主庄园的杂物棚里找到叶卡捷琳娜时期的、保罗时期的或亚历山大时期的一张桌子，一件三扇镜妆台，一张安乐椅，于是买回去，一年四季在地下室里摆弄它们；抽烟，沉思，眯起一只眼瞅那古玩艺，想方设法使它复活；爱那古玩艺儿爱不释手；没准还会在书桌的夹层抽屉里找到个小小的八宝箱，箱里还保存着一束发黄了的信札。他们是复古派，眼睛

回过头去看过去，盯着那古玩艺儿的年代。他们必定是古怪的人，把千奇百怪古董古怪地转卖给同样古怪的古董收藏家，买卖成交时还和收藏家一起喝成交酒：把整装白兰地倒进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四棱瓶，再从四棱瓶斟到镶金砌玉的御盏里。

第二章

1928年。

小县城——俄罗斯的布吕赫，俄国的镰仓。三百年前，留里克王朝的最后一位王太子曾在此被害。被害那天王太子和图奇科夫贵族后裔在一起嬉戏。图奇科夫一脉在本城绵延迄今不断，乃如该时所建的修道院和该时一些名气较小的贵族至今仍能见到那样……它是罗斯古迹的保留地，一个小县城，地处伏尔加河上流深水航段，有森林、四面沼泽围绕，有三三两两的村庄在一旁点缀，有修道院，地主庄园。它连接着许多的其他小城市——特维尔，乌格利奇，雅罗斯拉夫尔，大罗斯托夫。它是个寺院群立的县邑，原是俄国的一块皇室领地。它有长遍除虫菊的街巷，有碑坊作为百年纪念和惨案的纪念。县城离莫斯科二百俄里，离铁路五十俄里。

这里四处散着庄园的断垣残壁和旧时的红木家具。这里的博物馆馆长头戴高筒礼帽，身着披风大衣，腰间挂着博物馆和各寺院的钥匙。他在酒肆当着人面喝茶，在储藏室里独自一人喝酒。他家中堆满十三世纪、十五世纪、十七世纪的遗物：圣经，圣像，大司祭的和主教的法冠，助祭的法衣，锦缎套袖，僧侣长袍，金银宝石衣饰，盖圣餐盘的方巾，裹尸布和祭坛上的裙布。他书房里陈列着卡拉津的红木家什，书桌上放着卡拉津的外形如同贵族盔帽的烟缸。

维亚切斯拉夫·巴甫洛维奇，也就是说卡拉津老爷，革命爆发前二十五年因生性耿直而离开了他曾为之服役的近卫重骑

兵团。他的一个同事盗窃了公款，上级派他调查，他向上级实事求是报告了。但上级有意掩护盗用公款者，他无法忍受这一切，他写了第二份报告——请求解职的报告。从此他蛰居庄园一般不出来，一星期只出一次门，为的是到县城来买日用品。每次出门，他乘坐笨重的大马车，随带两名仆役。他伸出戴白手套的手来，指示店掌柜为他称半磅鱼子酱，半磅多一点儿干咸鲟鱼肉和鳕鱼肉。一个仆役付款，另一个仆役接过买下的商品。有一次，店掌柜为表敬意，想跟卡拉津老爷握手，但后者手也不抬，只说了句：“算啦！”卡拉津老爷头戴贵族制帽，身着尼古拉式大氅。革命迫使他从庄园迁来县城，但那制帽和大氅还是留给了他。现在卡拉津老爷仍然戴着那顶制帽排队购物，不过，现在是他妻子跟班。

卡拉津靠变卖古董过日子，为此常去找博物馆馆长。在馆长那里他见到革命后从他庄园里没收来的旧物。不过他没有为之心动。有一回，他瞧见馆长书桌上放了那只外形像贵族制帽的烟灰缸。

“把这拿开，”他简短地命令。

“为什么？”馆长问。

“俄国贵族的制帽不应当成为烟灰缸，”卡拉津老爷回答。

两位古董家起了争执。卡拉津老爷气愤地走了，自此再没跨进博物馆馆长家的门槛。城里的一个马具匠怀着感激之情回忆他早年在老爷府里当小厮时的往事，说有一次因手脚怠慢，老爷用左手赏了他一记耳光，他七颗牙齿被打落了。

县城冷清清的而且很压抑，一昼夜只能听到两次航班经过时冲破沉闷的汽笛声和教堂的古老钟鸣。但那钟声只响到1928年，因为1928年许多钟都被摘下，送去冶炼厂了。一般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用辘轳、滚木和大索把钟吊到钟楼外面，让钟自行坠落。随着辘轳和滚木的滑动，那钟发出沉郁的呻吟。呻吟声久久地滞留在沉郁的县城上空。每口钟尖叫坠地时都把地砸成一公尺半左右的深坑。

摘钟的那段时间里，县城也像古钟那样在呻吟。

县城里最派用场的是工会证。商店门前排队的分作两行，一队人有会员证，另一队人没有。有工会会员证的租用伏尔加河上的游艇每小时十戈比，非会员得掏四十戈比。电影票价对非工会会员每张二十五、四十及六十戈比，对会员每张五、十和十五戈比。能与工会会员证并驾齐驱的只有食物配给证。而配给证，当然，还有与之相关联的面包，只发给有选举权的人，每人每日四百克定量。没有选举权的人及其子女不予配给。影院设在工会大院的一个生有火炉的板房里。电影开场通常并不按铃通知。全城的作息时由电厂发出统一信号：第一次信号——该结束早茶的时候了，第二次信号——整衣出门上班。发电厂工作到子夜一时，但逢列宁生辰、十月革命节或其他意料外的节日——如执委会主席或工业联合企业主席等领导者寿庆，发电厂破例通宵服务，普通居民连带沾光，乘此庆贺自家的生日。有一次，有个姓萨茨或卡茨的某内贸全权代表，在头脑极其清醒的状况下出奇不意碰撞了执委会主席夫人，该夫人不屑一顾地啐了他一句：“竟敢对我库瓦尔济娜如此冒失！”萨茨一时不知这个姓氏的厉害，但在惊讶之余，仍连连道歉，后来还是落了个滚出县城的下场。县城领导自成一体，他们出于与生俱来的不信任感，在提防着其他居民。但他们的生活乏味，用无谓纠纷代替社会活动。当然领导层内部也有工作调动，例如县城的某一领导调任另一岗位的领导，但这纯属

内部调整，根据的是拆东墙补西墙及事贵人和的原则。协调经济也同样用东挪西借的办法。在县城，经管经济的是联合企业（联合企业产生于本篇主人公伊万·奥若戈夫成为神经病人之后）。其管委会主席是库瓦尔济娜夫人的丈夫库瓦尔金。工农检查委员会全权代表是普列斯努欣，主席则由涅多苏戈夫担任。在他们的管理下，革命前的财物逐次耗散。他们也重视遗产，无奈挥霍无度，不善经营。榨油厂亏本；锯木厂亏本；制革厂不亏，但不赚钱，更无所谓折旧资金。在那大雪铺地的冬天，动用了四十五匹马和全城的一半居民，把一只大铁锅从五十俄里开外的地方拖到制革厂，可拖到制革厂便报废，纳入盈利和亏损部分报销了，因为不适用。那时候，为铡草而买了一台树皮粉碎机，后来也废置不用——麦秸究竟不是树皮！为改善工人居住条件，能像建筑工那样住集体住宿，买下了一幢二层楼木结构房子。拆房，搬运，到了工厂把它锯成一段段有用的木料。锯成的木料共计五立方，十三根，因为其余的业已腐朽，没法用了。用这十三根木料，外加九千卢布，建成了工人宿舍。新屋落成之日，也是工厂倒闭之时。它之所以倒闭，并非因为像其他厂家那样亏了本，而是没有利润。新屋权且空闭。联合企业靠变卖革命后未复工企业的设备来弥补亏损。变卖的方式挺奇巧：管委会主席库瓦尔金向管委会委员库瓦尔金出售一批木料，以固定价格打折计算，计约二万五千卢布；管委会委员库瓦尔金转手卖给居民，其中一小部分卖给库瓦尔金个人，按固定价格，得五万余卢布。1927年将临之际，管委会庆祝其成功，决定赠库瓦尔金一只皮包。买皮包的钱列入待报销项目，由出纳员暂付，然后征集居民签名，让大家分担费用。收集来的钱归还给了出纳。领导层受居民阶层的影响，他

们的生活也是闭塞的，兴趣是狭隘的，对新鲜事物没有感觉。县城出售两类酒：伏特加白酒和教堂用的红甜酒。其他的品种没有。伏特加的需求量很大。红甜酒比较小，但数量也不少，因为领圣体时非用它不可。县城里卖的纸烟大炮牌每包十一戈比，拳击牌十四戈比。其他牌号的缺货。买烟像买伏特加，要排长长的队：有工会会员证的排一行，无证者另排一行。一昼夜间有两趟航班打这里过。轮埠的小店里能买到萨福牌纸烟，波尔图葡萄酒和花楸露酒。它在城里没法见到，因为城里没有个体商。买萨福牌烟要超过个人预算，买得起的显而易见钱的来路不正。县邑是个小城，居家过日子要另找额外收入作补贴，靠菜园子，靠互相照顾和为彼此服务。

县城里有顶斯库特林桥，斯库特林桥畔有幢称作斯库特林府的房子，里面住着雅可夫·卡尔波维奇·斯库特林本人。他虽八十高龄，农民有事还来找他当跑腿。雅可夫·卡尔波维奇·斯库特林有两个年龄与他相差悬殊的胞妹：一个叫卡皮托莉娜，另一个叫里玛。他还有个胞弟，名叫伊万。他们不住在一起，但住同一县城。伊万后来改姓奥若戈夫，成了懒家伙，有关他的事我们以后会说。

雅可夫·卡尔波维奇最近四十年来一直受疝气的折磨，走路时须用左手伸进裤裆，托住下垂部分。他的双手非但浮肿，而且发育。他喜欢抓起盐瓶，给面包撒上厚厚一层盐，以至嚼面包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吃罢，他把散落在桌上的盐粒小心翼翼地捡起，归到盐瓶里。最近三十年雅可夫·卡尔波维奇的作息有点儿离谱。深更半夜醒来，满带劲地诵读《圣经》，直读到晨曦映窗，然后倒头睡到正午，正午去阅览室读报。报纸在县城没有零售。订吧——没钱。要读报，就得上阅览室。

雅可夫·卡尔波维奇身子发福，已经谢顶，长一双见风便流泪的眼睛。他开口说话先喘上一阵子气。斯库特林府原属地主韦列伊斯基，后者因农奴制的废除和丢了调解法官职务而破产。雅可夫·卡尔波维奇原在军队服役，那年服役期满，回来在韦列伊斯基手下当了名录事，懂得了衙门诀窍，乘韦列伊斯基不走运收购了他的房子，他的职务被代替了。这幢房子自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至今仍然完好，只是由于一百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不免像宅主人的年久月深的红木家具那样显得稍稍暗淡，玻璃窗框增加了霉绿。雅可夫·卡尔波维奇对农奴制记忆犹新。老头儿记得农奴制庄园里的老爷、塞瓦斯托波尔大募兵、最近五十年来所有俄国的部长和苏联人民委员的名字和父称、所有帝俄时代的大使和苏联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列强的所有外交部长和总理、帝皇和大主教的姓氏。老头儿忘了自己体衰年迈，夸口道：

“我比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尼克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沙皇和革命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活得还长，我还要超过阿历克谢·伊万诺维奇！”

老头儿的笑容特别使人不舒服：既像谄媚，又像似笑非笑，笑的时候总是翻着他那双泪眼。老头儿脾气古怪，他几个儿子的脾气也像他。1905年前有一天，他命长子亚历山大送一封急信，但人到轮局时没赶上航班，为此他打了儿子一记耳光，并命令他“滚蛋”。这记耳光是赐给儿子的最后一次父爱。那时亚历山大十四岁，领了这份父爱掉头便走，一去六年，回来时已是艺术学院的大学生。六年中父亲几番写信命他回家，否则将剥夺他的天伦之乐，并且一辈子诅咒他。儿子在信尾父

亲的签名下面批了“去你的吧！”，把信原封不动退回了。六年后，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亚历山大走进了客厅。父亲笑着举起手，揍他。儿子一笑，双手捉住父亲的腕关节，又粲然一笑。笑里蕴藏着欢愉和力量。他钳住父亲双臂，略使腕劲，让对方跌坐在桌旁的椅子上，从而说道：

“您好，爹！何必费心呢，爹！还是坐下的好，爹！”

父亲气喘吁吁地发出一阵干笑，忙招呼老伴：

“玛丽亚，亲爱的，嘿嘿，伏特加，给我们来点儿伏特加，亲爱的，要冰窖里的，再来个冷盘！儿子大啦，长大啦！狗儿子叫咱俩受气来啦！”

他的几个儿子都已成才：神甫，芭蕾舞演员，医生，工程师。最小的两个像长兄，也像父亲，也像长兄那样，是从家中赌气出走的。最小的儿子成了共产党员，他就是工程师阿基姆·雅可夫列维奇。他出走后再没回过家门，即使回他出生地，也只借住在他姑姑卡皮托莉娜和里玛家中。1928年雅可夫·卡尔波维奇的几个大外甥早已娶妻成家，此时他最小的女儿才只二十岁。这是他唯一的女儿，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没能受到任何教育。

在这幢房子里住有老头儿本人，他的老伴玛丽亚·克里莫芙娜和小女儿卡捷琳娜。冬天只一半房子生火。房子如同主人的生活那样没有变化，早在叶卡捷琳娜女皇，甚至彼得大帝前就这模样儿。叶卡捷琳娜时代的红木家具在屋里数它流逝的日子。老少三口靠经营菜园过活。家中使用的工业品只有火柴、煤油和盐。工业品由父亲亲自掌管。玛丽亚·克里莫芙娜、卡捷琳娜和老头儿一年四季都忙于地里的白菜、甜菜、紫萝卜、白萝卜、胡萝卜和麦芽制糖。夏天黎明时总能见到老头儿身穿

睡衣，打着赤脚，一手拄棍，一手插在裤裆里，踏着早露放牛。冬天老头儿只在精神好的时候掌灯，平时让母女俩坐黑。中午老头儿上阅览室读报，记诵一个个人名和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新闻；卡捷琳娜坐到钢琴前练习科斯塔夫斯基谱的赞美诗。她参加教堂的唱诗班。老头儿傍晚回家晚餐，上床睡觉。黑沉沉的屋子里只有妇女的絮絮低语。有时卡捷琳娜去教堂参加合唱练习。父亲夜半醒来，点灯用饭，朗朗地背诵《圣经》。清早六时他又躺下睡了。老头儿不分黑白昼夜；既不怕活，也不怕死。在他面前，母女俩从不吱声。母亲熬麦糊，做汤，烙饼，通炉子，制酸奶，做肉冻（为外甥准备的）。生活同俄罗斯十五世纪、十七世纪的生活一样，食品也和十五世纪、十七世纪的食品一样。玛丽亚·克里莫芙娜，这个枯槁的老太婆，是个神奇的女人，是俄罗斯农村随同圣母像一起保留下来的妇女典型。她完全服从于丈夫的残酷意志。五十年前，婚后第一天她刚穿上绛红丝绒背心，丈夫问：“穿给谁看？”她还没能从他话里清醒过来，丈夫接着又问：“穿给谁看？”她还没能从他话里明白过来，丈夫接着又问：“穿给谁看？脱下！你没这身打扮我也认得，对旁人嘛，那就甬去卖俏啦！”丈夫用蘸着口沫的大拇指戳她的脑瓜，告诉她该怎样梳头。丈夫的残酷意志逼使她把绛红丝绒背心永远藏进箱底，并乖乖地走进厨房。是丈夫摧毁了她的独立意识，还是以沉默作为抗争？她永远那么顺从，自尊，沉默无言，忧郁，却又那么心地善良。她的生活范围从未越过栅墙，出了栅墙她只有一条去教堂的路，就像人生只有一条去墓地的道路。她和女儿一起练唱赞美诗。她六十九岁。彼得大帝前的罗斯在这幢房子里凝固住了。老头儿已忘了他有多大年纪，每夜背诵《圣经》，每隔几个月，在安安静

世界禁书文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静的夜晚，秉烛走到妻子床头，悄悄说：

“玛丽亚，亲爱的，嘿嘿！玛丽亚，人生一世，嘿嘿！”

他拿着烛台，泪眼在笑，手在打颤：

“玛丽亚，嘿嘿，是我呀！人生在世，玛丽亚，嘿嘿！”

玛丽亚在胸上画十字。

“雅可夫·卡尔波维奇，您怎不害臊！……”

雅可夫·卡尔波维奇吹灭了灯。

女儿卡捷琳娜的一双蜡黄眸子由于夜梦不绝而显得呆板，
她的手和脚像树段，鼓鼓的乳房像乳牛。

……小城，俄罗斯的吕布赫，俄国的镰仓。

第三章

莫斯科的繁琐事情不计其数，有开始的，有完成的。公共汽车和街道两侧的屋宇在同时飞驰，驰向远方，驰向高处。国家出版局、电影院、各种代表大会各种各样的招牌和标语都在嚷嚷。纵横南北东西的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的喧嚣在证明着首都的忙碌。

列车驶出莫斯科时已是夜晚，黑沉沉的夜晚。发热病般的莫斯科喧嚣仿佛叫哑了嗓子，而且哑得那么迅速。旷野里黑沉沉，一片寂静。寂静不久钻进了车厢。软卧的一个双人间里，坐着别兹杰托夫兄弟俩——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和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两人是红木古董家。他们的衣着打扮不伦不类：按上身的时新常礼服判断，像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时期的商人，但在时新礼服外面却又套了件带褶的旧式大衣。他们的脸盘很明净，富有雅罗斯拉夫尔的斯拉夫人特征。他们各有一双聪明但空虚的眼睛。列车在漆黑的旷野里挟着时间往前奔驰。车厢里发散着熟皮子味和大麻味。忽而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从提箱里拿出一瓶白兰地，一只银酒杯。他斟满，一口干了，再斟满，不言不语地推给他弟弟。弟弟一口干了，把空杯推给了他，由他把空杯和酒瓶放回提箱。

“小花玻璃项链买不买？”斯捷潘问。

“当然买，”帕维尔答。

有半个钟点两人都不讲话。列车往前奔驰与时间一道，只在靠站时才让时间缓一口气。帕维尔拿出酒杯酒瓶，饮罢，给

弟弟斟了一杯，饮罢，收进提箱。

“要不要请姑娘？要不要找乐子？”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问。

“当然要，”帕维尔答。

正深夜时分列车驶近伏尔加河，离开以制靴工艺闻名全国的那个村子已经不远，皮子的气味越来越浓烈。帕维尔啜完最后一杯白兰地。

“能不能把亚历山大也带上？”斯捷潘问。

“不能，”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简短回答。

车站上堆满俄罗斯式高腰皮靴。俄罗斯乡间土路之泥泞及行路之难不是以哲学，而是以这些靴子来论证的。从这如此庞大的手工艺品上发出一股焦油味。夜，也像那发散着浓烈气味的焦油一样乌黑。皮匠们在站台上奔忙。站台外遍地泥浆。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没多言语，出四十戈比雇了部去轮埠的马拉小车。那些马车夫在暗地里像皮匠般动不动破口对骂，而皮匠是骂街出名的。因为湿度大，伏尔加河上水汽缭绕。对岸亮着制靴匠人乘夜操作的点点灯光。一伙从事倒卖的犹太人在轮船的餐室里寻求刺激，由穿猴皮大衣的年轻女人执壶。他们折腾到笛鸣三遍方始离去。船上的灯熄了。宽广的伏尔加河面上起了风。湿雾沁入了船舱。餐室女招待，一个健壮女人，一面在餐桌上为别兹杰托夫兄弟俩拾掇铺垫，一面谈她的情夫，说他从她那里偷走了一百二十卢布。轮船带着靴皮味离开了码头。甲板上的旅客唱起绿林响马的山歌驱寒。灰蒙蒙的黎明勾画出一幅不是十四世纪而是史前时期的画面：十四世纪的欧洲已有木筏、渡船和村落，但这儿只有荒山野岭，野松林，白桦树，水边的圆石，泥土和水。到中午时刻轮船方到十七、十八